

一纸家书映初心

“只见假山坡下的一把长椅上，坐着一位青年女子，穿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，脚上是双绛色高跟皮鞋。她正在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，望着里边的镜子，用手轻抚鬓边的短发。在我们快走近她时，她合上了小手提包，抬起头来转向我们，脸上泛起亲切的微笑……”

第一次看到这段历史回忆时，我很难想象这位对镜梳妆、青春爱美的女子，是耳熟能详的女英雄赵一曼，来自我四川老家的那位奇女子。更难以想象，这样一位清秀的川妹子，到底如何熬过了那些闻所未闻的酷刑？

赵一曼牺牲前留给幼子的那封著名遗书，既是泣血深沉的人间至爱，也是寄望来者的殷殷重托：“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在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！”这里既有钢铁般的革命意志，更有作为母亲最深沉的舐犊之情。

阅读浩如烟海的红色家书，无数撼人心魄的细节，如穿越历史烟云的道道闪电击中我的心灵：他们怀“私爱”愈深沉，愈将“博爱”奉为主臬；他们视“情义”如泰山，却以“割舍”成就大义；他们为革命献出生命，却因“现代”彰显价值。原来，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只属于泛黄的历史，更属于当下和未来。红色家书既是一部中国革命的真实见证，也是一部人生百科的生动教材。

红军骁将陈毅安留给妻子李志强的54封“红色情书”，就像是一部现代爱情“教科书”。1923年夏，陈毅安与李志强订婚时，一个是湖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高材生，一个是有进步思想的农家女子。陈毅安在一封封家书中无微不至关心妻子的学业、身体、情绪，热烈地倾诉相思之苦：“我自离开你以后，我的灵魂

我喜欢在街头漫步，感受鲜活沸腾的烟火人间。

邮局背后的小巷，古朴幽静。巷子尽头紧挨围墙的角落，长着一棵脸盆粗的香樟树，亭亭如盖。一个小小的理发摊，一张四方棋桌，常年与香樟树做伴。

摊主马师傅，60多岁，腰板挺直。别看设施简陋，洗、剪、推、刮、吹全套工序毫不含糊，每每将顾客拾掇得神清气爽。待顾客坐定，马师傅绕顾客转一圈，看清头形，胸有成竹拿起推子或是剃刀，或行云流水一气呵成，或凝神屏气小心翼翼……其忘情专注状，犹如打磨一件艺术品。

理发一次，收费10元。这在繁华都市，堪称“友情价”。马师傅古道热肠，但凡街道组织公益理发，他都雷打不动参加，早出晚归，乐在其中。

听说，早年在安徽铜陵老家，马师傅是远近闻名的乡村理发师。10年前，他来到深圳照看孙子，喜欢上了这个冬天不冷的城市。孙子上了初中，他闲来无事，重操旧业。

街道不到3平方公里的中心区域，分布着10多家裁缝铺。“刘大姐裁缝铺”招牌并不显眼，门面不足半间房，位置偏僻，却门庭若市。她改衣服恰到好处，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。

刘大姐为我量体裁衣，我脱口而出：“我裤长每次都是97厘米。”刘大姐掷地有声：“你穿不了97，只能穿95！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“你只能穿95，再长就要踩到裤脚！”刘大姐语气之坚定，仿佛不能置疑太阳东升西落。

穿上改好的裤子，感觉利索许多。仔细回想，这些年来，我不少裤子尚未显旧，就从裤脚裂线、开缝甚至破烂。刘大姐所言确实在理。

窗明几净，12张长条木桌有序摆开。这是一家鲜烫牛肉米线店。门口立着一块白底红字告示牌：“如果您出门在外，遇到暂时困难，请您告诉我们，我们将为您赠送‘爱心餐’。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越来越好，有朝一日有了能力，请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，力所能及帮助那些陷入困境者。”

华灯初上，我走进这家米线店。汤汁，浓郁醇香，牛肉和米线，分量足味道美。

一连数天前往，我与店老板熟络，才得知“爱心餐”的来龙去脉。2005年，店老板钟先生从云南临沧赴深圳谋生，钱花完了，吃不起饭，晚上露宿街头。幸亏一家米线店老板收留他，让他在店里帮忙，包吃包住，并支付月薪。5年后，钟先生创业开米线店，以“爱心餐”回报社会。来自湖北襄阳的王先生曾一度落魄，吃过“爱心餐”念念不忘，后来致富思源，持续资助山乡学子。爱心犹如石子，当它投向社会的湖面，就会荡漾一圈又一圈爱的涟漪。

我喜欢漫步街头巷尾，在无心插柳的行走中，遇见那些美好。

·遇见·

不知飞到哪里去了……”在陈毅安的热忱鼓励下，李志强发奋读书，考上了长沙的女子师范学校。这对年轻人在革命洪流中比翼齐飞，携手共进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，陈毅安和妻子达成一个“生死约定”：如果有一天牺牲，会托人寄回一封“无字信”，以免她空等。1931年3月的一天，李志强真的收到了陈毅安一封没有只言片语的空白家书。原来，早在前一年的8月，陈毅安在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中已经牺牲。这封信正是他出征之前，嘱托战友代为寄出的最后一封家书。

一封“无字信”，道尽生离死别，只留永恒沉默。陈毅安用一个悲壮的结尾，践行了对爱人最后的承诺，用生命捍卫他心中追求的光。

红色家书中数量最多、最撼人心魄的，莫过于革命先烈留下的“绝命书”。阅读这些悲壮诀别的最后遗言，其间固然不乏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，但更触动人心的，是他们一面缱绻不舍地再三回望，一面步履从容地踏上生命绝途。

刘伯坚烈士留给妻子王叔振的遗书，寥寥数语，百转千回；铁笔铜钩，一丝不苟。“十二时快到了，就要上杀场，不能再写了，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”，结尾这一句从容淡定，令人心弦颤动。

其实，刘伯坚完全有机会可以不死。当时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，以及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邓宝珊，在大革命时期与刘伯坚一同工作过，都对他极为赏识。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后，他们虽然分道扬镳，但仍对刘伯坚夫妇“殷殷照顾”。然而正因如此，刘伯坚在给兄嫂的另一封信中，极力相劝“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”。他在信中留下铮铮

这片被群山围合的地方，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，叫铜锣湾。

夏至前，驾车行驶在江西于都县段屋乡围上村蜿蜒的彩色村道上，雨后的阳光新鲜闪亮，几株古树像笔挺的卫士守在村口。历史凝固在长着青苔的砖石和小路上，虽无声，却暗藏着力量，仿佛一阵风，就能唤醒那些轰轰烈烈的过往。

在那座建于乾隆三十年（公元1765年）的刘氏宗祠前，围上村的老支书记起隐藏在时间深处的村落互换轱事。铜锣湾原是肖姓人聚居地，肖氏一族世代代以养鸭为业。而刘姓族人，居住在几公里之外的邻水村落，主要以磨豆腐营生。在那个肩挑背扛的年代，刘家人要半夜起来磨豆腐，不然，赶不上铜锣湾的早集。铜锣湾的肖姓人养鸭需要离水源近，刘姓族人卖豆腐则要离街市近。不知是哪一方率先提议，两村的人互换了居所。

我转头望向宗祠深处，阳光正斜斜地穿过木格子窗，落在那一行烈士名录上。此刻，纵有千言万语，都变成了瞻仰与沉默。

1934年10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中央苏区局势危急，红一军团奉命移交防务，从兴国前线辗转撤离，集结在于都的段屋、宽田一带，军团部最终驻扎在围上的铜锣湾。听闻红军队伍要驻扎这里，村民们毫不犹豫腾空刚刚修缮完毕的刘氏宗祠，迎接革命队伍的到来。短短6日的驻守，书写了一段深厚的军民鱼水情。直到今天，每当说起当年往事，铜锣湾的人都会无比自豪。

92年前的那个秋天，红一军团在此休整时，村口要道上，一群少年自发组织在村口站岗放哨、传递军情。村里70岁的退伍老兵、老党员刘起保的父亲刘性真，当时就是村里的儿童团团长。如今，刘起保每每说起自己的父亲，都会一脸自豪。只可惜，村头的哨卡在红军走后的第二年被毁。2022年，在东部战区的帮助下，哨卡获得修缮。同时修缮的还有村中的革命井。

红一军团在铜锣湾扩红的时候，30多岁的段九长听了动员，踊跃参军，成为一名红军战士。因身材高大、性格沉稳，他被组织任命，肩负起守护通信设备的任务。历经磨难，百余人的加强连，最终仅剩段九长、谢宝金和钟余汉三人，穿过雪山和草地，成功把一台手摇发电机护送至延安。

围上村人把老红军段九长的故事，挂在刘氏宗祠的墙面上，让每一个走进铜锣湾的人，都能看到。

段九长本可以接受组织上的优转安排，却选择归乡务农。哪怕在盖不起房的困难时期，也叮嘱自己的后辈，要自力更生，千万不要给政府添麻烦。

一日匆匆驻足，终是装不下铜锣湾厚重的过往。当我们转过头，回望连片的千亩富硒稻田，绿意正盈盈舒展，如一卷被岁月重新装订的书卷，里面密密匝匝地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时代变迁，还有百姓生活的富足与美好。

永不消散的铁骨柔情

王 龙

誓言：“弟准备牺牲，生是为中国，死是为中国，一切听之而已。”

然而，就在同一封信中，刘伯坚对于流散四方的三个幼儿，牵挂萦怀，放心不下。

由于革命生涯辗转颠沛，他和王叔振所生的三个儿子只能寄养于别处，“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了不了家和个人。”由于与四川老家已有八年未通音讯，“人口死亡殆尽”，刘伯坚只好十分内疚地托付兄嫂：“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，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。”他希望兄嫂能够尽快将孩子找到，使他们接受教育，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。而对于孩子们的将来，他细致地告诫道：“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作工”，没有自立生活的能力不要过早结婚，“以免早生子女自累人”。

写完给妻子的遗书次日，刘伯坚在江西大余英勇就义。令人心痛的是，这竟是一封永远无法送达的“绝命家书”。他并不知道，挚爱的妻子王叔振已先他而去。就在刘伯坚就义前几天，王叔振在闽西游击区受“左”倾错误影响，于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，年仅29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王叔振冤案得以昭雪，她与刘伯坚的三个孩子——刘虎生、刘豹生、刘熊生，也在历经磨难后被党组织找到抚养成人。

书信纸短，家国情长。万千心事，脉脉谁诉。读懂了这些革命先烈的“心”，才能读懂共产党人的“魂”。他们既是忠诚的革命战士，又是父母膝下的孝顺儿女；他们既是钢筋铁骨的英雄志士，也有柔肠百结的亲情牵挂。那些仰天长啸的最后身影，组成了一条气壮山河的革命之路；那些九曲回肠的最后家书，蕴藏着静水深流的人格力量。

遍读红色家书，我发现一条令人感慨的规

律：几乎所有革命家中都面临经济困难，都清贫而拮据。陈潭秋不得不狠心把两个孩子送到岳父母家抚养；袁国平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，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这样高级的领导职务，也只能满怀歉意地说“此刻我身无分文，无法帮助家里”，他直言“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、为国家民族服务的”；高文华面对家中讲述的困难，甚至无奈地算了一笔“革命账”，将自己的经济困窘对家人和盘托出。

与此同时，清贫的革命者们在精神上又是那么富足。陈毅安在井冈山写的一封信家书所说：“我天天跑路，钱也没有用，衣也没有穿，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”，“因为是自由的，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”。

他们都是身无分文的革命者，尽管省吃俭用，依然人不敷出；他们又是如此丰足的革命者，身披风雨雷电，奔赴万里河山，为寻众生所愿。“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不聪明的人”。对比今天那些欲壑难填的贪腐分子，对比那些表里不一的“两面人”，这些舍生忘死的革命先驱令人高山仰止！

这是战士最烈的火焰，这是人间最真的诺言。他们并非牺牲了“人性”去成就“革命”，而是将人性中最美好，最温暖、最坚韧的部分，淬炼得更加纯粹与崇高。那些承载战火记忆、蕴涵亲情牵挂、寄托生死情感的家书，交织着对于伴侣的依依爱恋、对于父母的拳拳孝心、对于儿女的舐犊深情……字里行间的细腻与刚强、眷恋与牺牲、小我与大我，让人看到他们既是铁骨铮铮的战士，也是柔肠百转的凡人。这诀别之时的深情回望，更显其直面死亡的坦荡悲壮。当所有故事都变成传奇，每一个青春都荡气回肠。

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：张珊珊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你的脸庞，我们的目光

北 乔

红色，你的脸庞
你的热血和呼吸的激昂
镰刀锤头，每次抬头注视
拳头会攥得更紧
呐喊，让山一次又一次长高
山顶的巨石，屹立千万年

“太行，天下之脊”
我们的党，我们的八路军
我们的我们，山林
巨型庄稼，麦穗也在出鞘
血性，在暴凸的脉管里
在明亮粗糙的额头上

有些讲述一直在，就像
回到岁月里的身影，化作山脉
是太行山，又不仅是太行山
树叶与大刀，相似的形状
恰如其分的意味，水声
另一种鸟鸣的清脆

山峰，伸向天空深处
生根于记忆，为什么会有沉默
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坚守
当往事植于心底，一切都活着
风与目光相互缠绕
精神筑起高地，生生不息

由江蓝生任主编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（以下简称《大现汉》）于2026年4月出版。前些日子，江蓝生在江苏常州作了一场关于《大现汉》的讲座。江蓝生曾是吕叔湘的高足，她说，吕先生当年指出：“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，要编，就要突破前人；要编，就要有特色，有新意，否则就没有必要编。不要编成一部‘胖词典’。”

吕叔湘在《胖词典》里，不仅指出了江蓝生对《大现汉》的编纂，更蕴含着一种治学态度，一种人生智慧。

编成“胖词典”似乎是件容易的事。现在各类词典汗牛充栋，如果编者追求的只是内容的增加，进行物理意义上的重叠，虽说也要花一些功夫，但终究只是充当搬运工，或者主要是复制性的工作。编成“大”词典就不一样，这里的“大”不单单是指体量的大，还有内容的新颖与充盈。这就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到“突破前人”，踵事增华，才能让“大”变得有分量有质量。

推而广之，今日各行各业，亦有不少人热衷于表面的“大”，大项目、大业绩、大排场、大效应。一项工作还没开始，剪彩现场就人山人海，轰轰烈烈。材料越做越厚，汇报越讲越长，方案越来越庞杂，但细究起来，核心创见几何？实际成效几分？不得而知。《论语》有言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”文质彬彬，方是君子。工作中若只重形式之“胖”，不重内容之“实”，便落入“文胜质”的窠臼。唐代韩愈倡导“文以载道”，反对骈文的浮华空洞；宋代欧阳修等修《新唐书》，力主“其事则增于前，其文则省于旧”，追求精炼而非堆砌。这些古人的智慧，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。

魏晋时期，一些士大夫崇尚清谈，竞逐虚名，何晏、王弼等辈以玄学为尚，口若悬河，著作等身，看似学问“胖”得惊人，实则于国计民生难言裨益。《颜氏家训》批评得好：“博士买驴，书券三纸，未有驴字。”三纸文书不见一个“驴”字，这样的“胖”文章，不要也罢。

文章推崇“约”与“精”。《周易》云：“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”易简之中见天地之理。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一部《史记》囊括3000多年历史，要言不烦。司马光编《资治通鉴》，耗时19年，字斟句酌，删繁就简，300余万字厘清千年兴衰。这才是真正的“大”，而不是“胖”。

当下社会生活节奏快，信息泛滥，人们更容易陷入“胖”的陷阱。公众号动辄“万字长文”，书架上尽是“砖头巨著”，工作报告越写越厚，会议越开越长。仿佛谁的东西更“胖”，谁就更重视、更用力、更有价值。其实，真正的功夫，在于提纲挈领，在于把复杂的事情说清楚、做扎实。做人做事，莫不如此。与其贪大求全，不如精进专注，与其虚胖浮肿，不如瘦硬健康。删去不必要的枝蔓，减去无意义的冗余，留下真功夫、硬本领、真效益。

金台随感

长让小张准备会议材料时提了一嘴，乙方代表是他大学上铺，毕业后各奔东西，好些年没见了。小张心想，老同学碰面，这评审应该不会太为难吧？

质询环节，组长盯着厚厚的报告中一页参数字表，眉头越皱越紧。“这个值，比现行的国家标准低了3%。”乙方代表摆了摆手，“老同学，差一丁点儿，问题不大，评审过了我们马上改。”组长没接话，把报告往前一推，音量不高，但字字落地有声：“不达标，就是不行。”会议室静了几秒，乙方代表脸上挂不住，想说什么，对上组长的目光，话又咽了回去。最终项目未通过，乙方代表收拾文件时脸色不太好看。

小张忍不住问：“组长，您就一点儿余地都不留？”“地震事关人命。”组长说话时，眼睛都没离开过屏幕上的波形。

工作时间越长，小张发现这一行的“职业病”越多。

比如爱较真。新人同事说“近期这个台站的数据经常出现‘毛刺’”，组长当即追问“近期是几月几号开始？经常是每周一次，还是每天一次？有没有和当地的地震台联系不是仪器故障？”新同事被问蒙了，支吾说“大概……上个月，每两三天一次……我马上核实”。新同事出门前小声嘀咕“至于吗？”

小张想，等自己变成老张那天，如果有新人瞪大眼睛问“至于吗”，他就立刻回上一句“至于！”